

绍兴文理学院
北京鲁迅博物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

编

鲁迅

跨文化对话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大象出版社

鲁迅

跨文化对话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 跨文化对话: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绍兴文理学院等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47-4442-3

I. 鲁... II. 绍...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②鲁迅著作 — 文学研究 — 国际学术会议 — 文集 IV. ① K825.6-53
②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460 号

出版

大象出版社

发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27.5

定价

58.80 元

鲁迅:跨文化对话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目录

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吴中杰(1)
鲁迅:在流言伤害中挺立不屈	刘家鸣(8)
关于拓展鲁迅研究的几点思考	杨剑龙(16)
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陈越(18)
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	张梦阳(25)
“原鲁迅”:在双重传承与双重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	王晓初(33)
鲁迅的译介意识	孙郁(40)
跨文化精神食粮的运输——谈鲁迅翻译的小说和童话	孟念珩(47)
鲁迅林语堂翻译观比较论	王黎君(52)
鲁迅的“硬译”与周作人的“真翻译”	顾农(59)
跨国界与跨语际的鲁迅翻译(1925~1949)	
——中、日、台反法西斯的“地下火”与台湾光复初期“鲁迅战斗精神”的再现	徐秀慧(65)
碎片、发狂、永远重复的梦魇	
——人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看鲁迅与尼采文艺上的契合	[澳]张钊贻(77)
鲁迅是“殖民者”吗?	
——论鲁迅等中国文学经典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	朱文斌(91)
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	李春林(96)
“恶魔的美”:鲁迅与唯美主义	陈浩(102)
白璧德:被夹在鲁、梁之争的剪刀里	北塔(109)
对话与抗衡:鲁迅与前驱外国作家——从叙事层面考察	邹贤尧(115)
和而不同——论鲁迅与但丁	葛涛(120)
铁屋中的“放火者”——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	孟庆澍(127)
鲁迅与河上肇	乔丽华(135)
鲁迅对果戈里讽刺艺术的借鉴新探	迟蕊(140)
《野草》与《十夜梦》比较论	陈占彪(145)
跨越地域的比较——《苦恼》和《明天》分析	薛伟(153)
苦涩的微笑——《故事新编》与《二十二条军规》之比较	顾红亚(160)
漫漫荒荒路——从文化哲学视角分析鲁迅《过客》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异同	鲁雪莉(165)

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纪念章太炎、鲁迅师弟逝世 70 周年	赵敬立(171)
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佛学与国粹	施晓燕(178)
鲁迅与胡适:现代启蒙的两种可能性	周海波(184)
鲁迅与张炜:灵魂的守夜人	王吉鹏 冯 岩(192)
鲁迅与张天翼:锋利无比的“讽刺之刀”	赵 鹏(198)
差异自有契合在——鲁迅和闻一多艺术态度及人格之比较	李乐平(204)
由科学与人权并重到德赛两先生并举	张永泉(211)
论鲁迅的“立人”与新文化建设的逻辑关联	黄 健(225)
延安时期鲁迅启蒙小说传统的不断弱化	袁盛勇(232)
知识谱系的架构与改造——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	陈力君(238)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	
——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竹潜民(245)
鲁迅的 1933	姜异新(251)
文学感到现代的瞬间——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	[日]千野拓政(258)
鲁迅周围的人——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一面	[日]山田敬三(267)
论鲁迅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	曹树钧(276)
鲁迅的《藤野先生》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	[日]大村泉(285)
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的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	李冬木(297)
爱与复仇的新传说——从《铸剑》解读鲁迅的“性的复权”与“生之定义”	[日]汤山土美子(306)
“弃妇诗学”与“反弃妇诗学”话语	凌 逾(316)
《穆天子传》鲁迅抄本考	张 杰(323)
鲁迅论电影及电影中的鲁迅:官方制作和独立制作者“正传”	[澳]寇志明(327)
绍兴目连戏原型与鲁迅的主题意识	刘家思(337)
鲁迅与中西艺术文化——以《野草》图像为例	黄 薇(344)
论《野草》的视觉艺术及其渊源	江弱水(352)
略论鲁迅的语言观	寿永明(360)
鲁迅与中学文学教育改革	曹颖群(365)
读者:鲁迅诗学研究关键词	曹禧修(371)
上海英文报刊有关鲁迅逝世的报道	张 岚(378)
厨川白村著《近代的恋爱观》在民国文坛中的影响	[日]工藤贵正(384)
“诱敌深入”到中国腹地	
——满洲事变到上海事变之间鲁迅的抗日战争观	[日]吉田旷二(392)
关于藤野教授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批改	[日]阿部兼也(401)
疾病·“救人”·“救国”——对医学背景上鲁迅“弃医从文”过程的再认识	赵江滨 江 定(407)
“惜别照片”被弄错的真相	[日]渡边襄(414)
西村真琴和鲁迅诗作《题三义塔》——学习“度尽劫波兄弟在”	[日]石原忠一(418)
儿岛亨与鲁迅先生的渊源	[日]佐藤明久(423)
编后记	(433)

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吴中杰

在计划经济时期,作家的地位是由长官意志划定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作家的影响力往往借助于商业炒作。但是,文学自有它的发展规律。作家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既不取决于长官意志,也不能依靠市场炒作,而是由作家自身的思想趋向和作品的艺术成就来决定的。于是,时间老人就成为最权威的鉴定者,作家的价值,只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下来。鲁迅,曾受到过政治的追捧,但捧的未必是他的真价值,有时,为了某种需要,还会将原意进行歪曲;他也不断受到攻击,无论是生前或死后,但攻击的也未必是他的实在缺点,因而,他始终打而不倒。

鲁迅至今没有过时,他的精神还有着当代意义。这里我们且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这里,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算是知识分子。其实不然。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知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知识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精神,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群体。

我国古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一向是很强的。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表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是,要说到独立精神,那就比较差了。他们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依附思想。大多数文人依附于庙堂,后来也有一些人依附于商家。这种依附性,也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那时的文化人,叫做士。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缺乏后者的独立性,而被人所养。既然士为庙堂所养,自然也要为庙堂服务,他们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着庙堂的利益旋转的。这就叫做存在决定意识。其中志向大,自视高的,每每想做王者之师,一般的也总想弄个大官小官当当。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为中下层文士和武士走向庙堂提供了攀升之路。虽然能爬上去的人并不很多,但正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这样一来,这些“士”们,也就不去想那些庙堂不利之事了。

但是到得五四时期,情况就有了变化。科举已经停考,士人不能再通过这条路径攀向庙堂,而大学的相对独立和文化市场的发育,又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下,就产生了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一种时代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不但体现在新文化战士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同时代其他正直的学者身上。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湘乡南皮之间”的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就特别强调:“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是鲁迅。他不但在五四时期反对传统思想时,表现出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而且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许多新文化人士与权力者妥协,甚至支持权力者的时候,他仍旧坚决维护自由思想的原则与旧势力进行搏斗。最突出的表现在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对于被压迫学生的支持,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对于枪杀学生的暴虐者的抗争,最后他自己也被迫走出北京。

有人认为,鲁迅长期在教育部当官,却又要反对这个政府机构行政长官的政令,这是非常矛盾的,于是加以讽刺。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作为一个教育部的官员,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且敢于揭露教育当局以至政府执政者的反动嘴脸,坚决与之斗争,那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因为作为官员,本是受着上级政令约束的,若表现出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要冒很大的风险。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的呈文上,提出的理由就说是“又该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所以执政府马上照准。而鲁迅的答辩书中,也没有说他作为部员,在法律上是可以抗阻本部行政的。他之所以能够打赢官司,只是由于章士钊这位政法专家兼逻辑学家,竟疏忽了一项逻辑要素,在呈文中倒填了日子,所以为鲁迅所驳倒:“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当然,这与当时的司法还有相对独立性,平政院还能够据理判案有关,否则,下级是很难告赢上级的。但鲁迅作为一名教育部官员,敢于抗阻本部行政,支持被压迫的学生,后来又公开直斥政府执政者的暴虐行为,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那些比较自由的大学教授们,却还在帮权力者说话,两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能持此独立精神,与他早期所接受之个性主义思想有关。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介绍过西方思想家崇尚个性的主张和摩罗诗人争天拒俗的作品,并且提出救国之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①他的抗暴行动,就是这种个性主义的表现。

在上述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深一层的看法。1927年10月25日,他曾在上海劳动大学做过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其中就说到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他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鲁迅后期的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前期抗暴思想的延续。在广州,他目睹了国民党新军阀对于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疯狂屠杀;到上海后,又亲身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通缉。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抗。对当时共产党的某些举措,其实他并不很赞成,但是,为了支持被压迫者,他还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例如,共产党在1930年2月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共中央想借助鲁迅的声望,希望他也能做该盟的发起人,就派与鲁迅接近的党员冯雪峰去联系,据雪峰回忆,鲁迅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一成立马上就会被解散,不能起什么实际作用,但他

^① 《坟·文化偏至论》。

还是答应参加。他的名字原来排在下面的,到发表出来时,却升到第二名了(第一名是郁达夫),这当然很引起当局的注意,于是就有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之事。既然如此,他只有用硬功夫来对付。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决不会在压迫者面前屈服。直到逝世前不久,国民党当局通过鲁迅一个旧日的学生与他联系,说是可以解除通缉令,但希望“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却被鲁迅所拒绝。他写信回复道:“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①

接着,在1930年3月,鲁迅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且也应邀成为它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对这个组织也并不看好,在当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即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飏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按:原文如此),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也。哀哉!”这就是说,鲁迅之参加这个组织,还是出于爱护和培养青年之心。虽然他对左联有自己的看法,但当这个组织受到压迫,它的成员被捕、被害时,他仍要站出来抗议、斗争。

当然,鲁迅后期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血的事实面前,进化论的思路因此轰毁。但是,他的个性主义并没有同时轰毁。虽然鲁迅此时已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而阶级论必然要走向集团主义,但他仍时时保持自己的见解。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就反对“革命文学家”们的思想意识至上论,而同时强调文艺的审美性;反对超越时代论和虚假的理想性,而坚持文艺的现实性。左联成立之后,他对那些过激措施也很不满意,不参加这些活动,也不理会反“作品主义”的论调,而坚持用自己的笔参加战斗。甚至,在立三路线占共产党内统治地位时,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约鲁迅谈话,援引法国作家巴比塞为例,要鲁迅公开发表宣言,拥护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也为鲁迅所拒绝。所以,左联成立以后,鲁迅与那些领导人时常发生矛盾,也就并不奇怪了。

鲁迅与左联某些领导人的矛盾,不是仅限于最后一年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从“花边文学”的讥笑,到“调和派”的诬蔑,花样简直层出不穷,以至使鲁迅觉得要横站着战斗,以防“战友”从背后射来的冷箭。他最后对于周扬等人的鞭挞,只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而周扬等人却始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对鲁迅不够尊重罢了。这也只是因为鲁迅的地位过于崇高,才有此说,看看1949年以后,整了这么多作家,他又尊重过谁呢?可见这不是个人间事,而是两种文化种思想的冲突。这一边是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那一边则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场斗争的意义,鲁迅自己是认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抱病修改补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并说:“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②鲁迅一直在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斗争。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局限,鲁迅也不例外。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就“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问题所作的《答文艺新闻社问》中说:“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

① 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纪念集》。

② 1936年8月28日致杨霁云信。

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这后一部分意见，原是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甚至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也影响了鲁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鲁迅于次年还写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和《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的贫困和专政辩护。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意见显然不符合实际，但在当时有这样的看法却并不奇怪。因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整个世界的知识阶级都在向左转，个人主义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和纪德，都向往苏联，为苏联辩护。他们是到苏联参观，看到了某些真相之后，才有所怀疑，有所批评，——纪德因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而引起左派文人的围攻，其中包括罗曼·罗兰；但等到五十年后罗曼·罗兰本人的《莫斯科日记》发表出来，人们才知道，原来他自己也有批评意见，只是生前不愿公布而已。

鲁迅本有两次访问苏联的机会，一次是在1932年，高尔基邀请他去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鲁迅那时很向往苏联，本来准备要去的，但临时右脚神经痛，接着又因母病赴北平探亲，没有去成；第二次是在1935年，鲁迅却已不愿意去了。据知情人说，1935年冬，胡愈之正要从小香港出发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又来电要宣侠父设法转请鲁迅先生前往莫斯科治病，为此，侠父又请愈之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与鲁迅先生商量。鲁迅表示不愿意去，原因是如他去苏联，他就不便于及时在国内发表文章，不能与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挥不了战斗作用。鲁迅还说，在上海，国民党最多把我枪毙了，但他们不敢！如果到了莫斯科反而不见得好。另外，他从报上得知斯大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他在这个时候去苏联也不合适。愈之尊重鲁迅先生本人意见，只好单身又回到香港。”^①关于这段往事，胡愈之本人在1972年12月间接受北京鲁迅博物馆采访时也曾说到，只是在1976年10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上发表这篇访问记时，对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看法被删掉了，严家炎教授在《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一文中，根据胡愈之校订过的原始纪录加以补足。这段被删掉的话是：“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的。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可见，这时鲁迅对苏联的看法已有转变，也可见他对斯大林的专制主义的反感。

文艺创作的自主意识

说到文艺创作问题，人们很容易将鲁迅与“遵命文学”的口号联系在一起，好象鲁迅是“遵命文学”的倡导者。这是一种宣传力量导致的误解。

不错，鲁迅谈到他在《新青年》时期的小说创作时，的确曾经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这语气很有点勉强，而且带有某种调侃意味。所以接着做出许多解释：“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②这段解释，可以与《呐喊·自序》中“须听将令”的话联系起来看：“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

① 金城：《党的坚强战士》，《胡愈之印象记》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8月第二版。

②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正因为意见本来相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我说他语气勉强，且有调侃意味，不但从这段话本身读出，而且还有其他材料可作旁证。这就是鲁迅在《〈农夫〉译后附记》中所说的话：“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云。”可见鲁迅所说的“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显然是针对着新月社和创造社的“遵命文学”而来的，是一种调侃，一种反讽。后来的人为了强调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不管鲁迅说话的语境，抽取出来，作为鲁迅所提倡的创作口号了。

鲁迅说：“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于是我从此不说话。”^①何况鲁迅已死，他也无从说话了。

但如果查阅一下鲁迅著作，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是一向主张创作的自主性的。还在北京时期，鲁迅就反对配合形势去写作，他说：“即使是真的文学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②在广州，他又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③直到晚年病重时，他还说：“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④这里说的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最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27年12月在上海暨南大学做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这里，鲁迅开宗明义就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冲突的原因，在于文艺和政治的趋向不同：“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出现了反抗的文艺，就和政治不断地冲突起来。“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有人说，鲁迅在这里是指革命文艺与反动政治的冲突，而革命文艺与革命政治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其实不然，这并非鲁迅的原意。鲁迅说的是文艺与政治本身的冲突。所以他接着就分析革命成功之后的情况：“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这就涉及人们常常提出的一种假设：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采取什么态度？是歌颂呢，还是继续批判？我想，还是应该从鲁迅自己的话里去寻找答案。鲁迅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居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可见，在鲁迅看来，批判是文学的根本使命，只有高举批判的旗帜，

① 《坟·说胡须》。

②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

③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④ 《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才能促使社会的进步。

到得 30 年代,鲁迅深化此项命题的研究,又提出了“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概念。1932 年 11 月 22 日,他在北京大学做的一个演讲,题目就叫做《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用现代话讲起来,就是“在朝”的文学;山林文学则是“下野”的文学,“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什么是帮忙文学?就是帮主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至于帮闲文学,则是帮主人消闲的东西。鲁迅举例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箴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箴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箴片的职务。”——当然,这是指供人消闲的小说。

鲁迅用这个观点来观照文学史,就找出许多具体的实例。他认为,《诗经》中有几篇是用于侑酒的,也就有帮闲的成份;屈原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司马相如以辞赋见长,被“俳优蓄之”,也是一个帮闲。纵观中国文学史,鲁迅认为:“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不太多。”所以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鲁迅说:“看起来实在也不错。”^①

当然,鲁迅并不想在杂文和演讲里系统书写中国文学史,只是为了揭露现代帮闲文人,而探索其历史渊源。正如他自己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②这里,说古是为了道今。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③那么,知今又有利于说古。鲁迅是在观察现代文坛上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之后,才对古代文学有更深入的理解。

鲁迅对于当时文坛的剖析,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三十年代中期,有所谓“京海之争”,鲁迅当时写了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京派”与“海派”》,却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种剖析,真是入木三分。至于后来京海两派互送秋波,做起一碗“京海杂烩”来,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也还是利益问题作怪。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批判精神颇有非议,认为他好斗,缺乏宽容之心,有违自由思想原则。其实,鲁迅的批判,就是为了争取思想自由。鲁迅的文章,并非都是阶级观点之争,更多的是对于文人依附思想的批判。比如,他对于“现代评论派”的反感,多半因为那些当年在北洋军阀政权下拜服权势者“孤桐先生”的人,当国民党得势时,又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而且,有的人还与新的权力者相结合。他在《隐士》一文中,引了一句古诗“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来讽刺那些奔走权门的“隐士”,当然并非无的放矢。

但鲁迅并不因此而一笔抹煞中国文学史,他说:“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

① 《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② 《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

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而且,即使是写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人,有些还是重要作家,因为他们究竟有文采。鲁迅也并不苛求当代作家,他说:“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并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①

鲁迅的批判,特别是对于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批判,是为了中国文人能摆脱依附思想,走上一条思想独立的道路。这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

只可惜许多推崇鲁迅和非难鲁迅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这使我想起了恩格斯对黑格尔那段有名的论述:“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②其实,鲁迅的文学话语比起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来,要明白显豁得多了,只不过被有意地隐藏或无意地疏忽罢了。

现在应该是正确解读鲁迅的时候了!

(作者: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① 《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② 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

鲁迅：在流言伤害中挺立不屈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刘家鸣

鲁迅的一生，是在同旧中国专制统治势力的坚韧抗争中，不断地被迫害被诬蔑，历尽艰辛度过的。他说过：“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①鲁迅生活的几十年里，各种各样的流言，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横加罪名，恶意传播，连年不断地袭扰着他，严重地伤害他的身心。流言的阴影，围困笼罩了鲁迅的一生。他在许多杂文和书信里，叙写和表明了对于各种流言的愤恨和憎恶，揭露流言的卑劣手法和险恶意图，反击流言制造者的诬陷和阴谋。历史事实证明：鲁迅在层出不穷的流言伤害中挺立不屈。

1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就遭受流言的伤害。1898年春，他离家去南京求学，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流言的刺激。他回忆起，父亲逝世后，有一次同衍太太闲谈，她怂恿他在家里“到大橱的抽屉里”寻出首饰珠子一类东西“去变卖”。鲁迅十分反感。然而，不久“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那么，走罢！”^②莫须有的流言刺痛年青鲁迅的心，使他决意离开互相挤兑的封建故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③

在婚姻大事上，青年鲁迅又遭受流言的沉重伤害。1906年夏天，鲁迅的母亲听到谣传：说鲁迅和日本女人结婚了，而且还抱着孩子在东京街头散步。实际是，鲁迅有一天和许寿裳去逛公园，路上碰见一位日本妇女，肩背小孩，手抱婴儿，身后还跟着孩子。鲁迅连忙过去，替那妇女把手中孩子抱过来。这本是他仁爱助人的高尚品行，恰巧被一位同乡看到，误说误传成流言，使鲁迅的母亲听后心慌着急，接连写信并故意说自己重病，催迫鲁迅回国完婚。奉命结婚后，鲁迅对友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查无实据的流言催逼成无爱的婚姻，让鲁迅抱憾终生。

流言给予鲁迅最深重的伤害，乃是1923年夏天发生的兄弟“失和”事件。鲁迅和周作人原本“兄弟怡怡”的住在一起；突然间，周作人决绝地写信给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这是由于羽太信子在丈夫耳边造谣诬蔑鲁迅。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④章川岛直白地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

① 《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以下《鲁迅全集》的引用只注明卷数和页数。）

② 《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292页。

③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2卷，第292页。

④ 郁达夫：《回忆鲁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第75页，东北鲁迅学会会刊。

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他们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①

一年后，鲁迅在日记里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②羽太信子猖狂地攻击鲁迅，“多秽语”，把捏造的流言在亲友间扩散，沉重地伤害了鲁迅。因此，鲁迅后来有一个笔名：“宴之敖者”，意思是“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见对此事念念不忘。

1927年秋，鲁迅到上海不久，就陆续的有流言传出，先是说鲁迅要经商开店：“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用商人眼光看人。”^③后又传出鲁迅到艺术大学做教务长的流言，“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④三十年代初，流传在北京的谣言，是说鲁迅“在上海发了疯”，^⑤使得他只得写信去劝慰和化解亲友的惊诧忧心。

1934年春，北方报纸上有消息说，鲁迅患“重症脑膜炎”，要停笔十年。“这信息是从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⑥流言流传各地，老母饮泣，挚友惊心，使得鲁迅接连写几十封信去辟谣。他在信里斥责造谣的“文氓”，“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⑦他安慰友人说：“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如往日。”“我头脑冷静，健康如常”。^⑧鲁迅还给台静农写诗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三月十五夜闻谣戏作，以博静兄一粲。”^⑨这诗幽默风趣，表明鲁迅对诅咒式谣言的轻蔑鄙视，抒发了自己依然坚持抗争的乐观心态。

2

鲁迅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从来都是认真谨严的。他的作品和论著，大多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但仍有人造谣毁谤。他致友人的信写道：“我还听到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⑩鲁迅为《淑姿的信》写序，报上造谣说作者“金女士乃鲁迅之小姨”。鲁迅批驳道：“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的。^⑪

然而，最使鲁迅终生愤恨难平的，是陈源散布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谣言。1925年冬，陈源在《闲话》里暗示《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次年写《致志摩》中公然诬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陈源故意

① 转引自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孙郁主编：《周氏兄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② 《鲁迅日记，1924年6月11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500页。

③ 《致廖立峨 271021》，《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7页。

④ 《致史济行 290221》，《鲁迅全集》第11卷，第654页。

⑤ 《致章廷谦 300222》，《鲁迅全集》第12卷，第4页。

⑥ 《致萧军 341105》，《鲁迅全集》第12卷，第559页。

⑦ 《致姚克 340324》，《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9页。

⑧ 《致姚克 340315》，《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4页。

⑨ 《致台静农 340316》，《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7页。

⑩ 《致韦素园 261229》，《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0页。

⑪ 《致杨霁云 341209》，《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9页。

“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的，射向”鲁迅。鲁迅当即给予严正驳斥：“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根据森槐南，我却用法。

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①鲁迅指出，陈源其实并不知道这两种书的底细，不过听了“耳食之言”而故意写成文字发表，进行诬陷中伤。

直到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出版，鲁迅感到非常高兴。他写道，这原因“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②从这段激愤的文字里，可见陈源的“剽窃”流言，严重地刺痛和挫伤了鲁迅的心灵，竟达十年悠悠岁月。

鲁迅逝世后，那个曾经著文盛赞鲁迅的苏雪林，突然跳出来写信给蔡元培和胡适，泼妇骂街似的恣意攻击鲁迅，并且重复着陈源的“剽窃”谣言。胡适在回信里为鲁迅辩白：“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并称赞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③

所谓“剽窃”流言的散布者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顾的女儿顾潮在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④可见，陈源不过是把顾颉刚与他“谈及”的“此事”“公布出去”，用以诋毁鲁迅的人格与学术品行，否定鲁迅的学术研究。这种侮辱人格的流言，使鲁迅记恨终生，并在给友人的信里多次揭批顾氏的人品，申明与顾誓不两立。他还在《理水》小说中刻划了鸟头先生以讽刺顾氏，表现了对流言制造者的决绝与蔑视。

3

如果说，散布鲁迅生活上学术上的各种流言，是在侮辱他的人格，诋毁他的道德品行；那么，传播鲁迅在政治方面的谣言，则捏造得更加阴险恶毒，总是把鲁迅置于军政当局相敌对的境地，构陷他是政府和民族的罪人，为反动统治势力迫害他制造口实，借刀杀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关鲁迅的政治流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往往同当时政治领域的尖锐斗争，同当时政局

① 《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29页。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页。

③ 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转引自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每181页。

④ 转引自章培恒：《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的焦点或激烈的民族矛盾密切联系着，从而直接危及鲁迅的身家性命。

辛亥革命后，鲁迅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因为支持《越铎日报》批评军政府，有流言传出：王金发要派人暗杀鲁迅。鲁迅晚年回忆道：“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①

这是最早的因政治而危及鲁迅生命的流言，此后，性质类似的谣言时有传播。

1925年10月，北京爱国民众和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关税协定，举行游行示威，遭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报上造谣：“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这在暗示鲁迅同爱国游行相关联，为军阀迫害他制造舆论。其实，鲁迅那天却是“生些小病”，“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②不久，他在文章中批驳：“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③这样讽刺的文句，表达了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愤慨。

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并且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闯袭国务院”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鲁迅名列第二批通缉名单中。此前，陈源散布流言说：女师大学潮是某籍某系的人暗中鼓动的。某籍某系是指浙江籍的国文系教师，暗示包括鲁迅等人。鲁迅在《大衍发微》文中指出：陈源的流言就是段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的来源和依据，直接揭露了陈源之流所谓“正人君子”的险恶用心和流氓的作用。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中山大学因援救被捕学生不果和顾颉刚要来任教等原因愤而辞职。不久就传出谣言。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又说：“‘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的，……大约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④说鲁迅“亲共而逃避”，在当时足以成为反动派镇压的口实，意在陷人于死地。

1931年初，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接着报上刊发“鲁迅被捕”的谣言，远播国内外。鲁迅接连发信辟谣。致韦素园的信说：“其实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不过这一回造得较大，还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⑤在致留学日本的李秉中信写道：“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地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⑥后又写信道：“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又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又闻天津某报曾载我‘已经刑讯’，亦颇动旧友之愤。又另有一报，云我之被捕，乃因为‘红军领袖’之故云。”^⑦这是蓄意通过谣言，唆使军政当局加紧迫害鲁迅。

1933年夏，杨杏佛被特务暗杀。《社会新闻》刊发消息，造谣左翼作家纷纷“都以避暑为名

① 《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第361页。

② 《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第247页。

③ 《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第157页。

④ 《致章廷谦 270530, 270612》，《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5、548页。

⑤ 《致韦素园 310202》，《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页。

⑥ 《致李秉中 310204》，《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页。

⑦ 《致李秉中 310306》，《鲁迅全集》第12卷，第42页。

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然而，鲁迅写信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宣称：“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便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爱国情绪普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成为社会主潮。这时，关于鲁迅的流言又出新招，反动文人造谣鲁迅是“亲日”的汉奸，“替日本做侦探”，“意在卖国”。鲁迅给多位友人的信里说：“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①“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②“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③鲁迅给姚克的信里说到斯诺所作《鲁迅评传》时指出：“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④鲁迅对曹聚仁说：“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⑤

从鲁迅这些书信的揭露可见，走狗文人乱造谣言的阴谋企图是：一来把广大民众的民族义愤引向鲁迅，让他遭万人唾骂，身败名裂；二来把卖国的罪名强加鲁迅头上，从而掩饰和庇护那些真在卖国的政客权贵；三来为军政当局以严惩汉奸的借口加紧迫害鲁迅。这真如他说过：“在中国，却确是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⑥

反动文人制造的谣诬，固然使鲁迅憎恶愤恨；然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对他的种种流言，让晚年鲁迅更加愤怒悲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和反动文氓小丑同流合污，散播流言，伤害鲁迅的身心。他给友人写信：“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于是此后看见‘文妖’二字，便以为就是骂我，互相报告了。”^⑦当所谓“第三种人”露出本相，帮统治压迫左翼作者时，自己队伍里却传出中伤害鲁迅的流言。他给曹靖华写信说：“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⑧

左翼文化队伍里，有些年青人“唯我独左”，故作激进，唧唧喳喳，传说鲁迅近年来不大写文章，不做事之类流言，使他气愤反感。他给萧军写信说：我“力所能及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⑨

给曹靖华写信说：自己“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

① 《致山本初枝 330929》，《鲁迅全集》第13卷，第536页。

② 《致杨霁云 340515》，《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9页。

③ 《致郑振铎 340516》，《鲁迅全集》第12卷，第414页。

④ 《致姚克 331105》，《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7页。

⑤ 《致曹聚仁 340602》，《鲁迅全集》第12卷，第440页。

⑥ 《致韦素园 310202》，《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页。

⑦ 《致窦隐夫 341101》，《鲁迅全集》第12卷，第556页。

⑧ 《致曹靖华 350207》，《鲁迅全集》第13卷，第47、48页。

⑨ 《致萧军、萧红 341206》，《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6页。